

耶律铸副文本的文化意义： 13世纪的世界知识生产、文脉赓续与学术预流

邱江宁

〔摘要〕 13世纪，蒙古人狂飙突进的世界征略历程，不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更使得世界各区域的知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交流。身处其间的文人，他们所承荷的书写使命其实是双重的，既需传递新知识，又要赓续传统审美。耶律铸一生追随蒙古人的征伐足迹，多涉历西北极远之区，作为极少数亲见亲闻且留下汉语书写作品的代表文人之一，耶律铸将自己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世界见闻与传统知识处理成副文本形式，在正、副文本间构建起极富意味的对话场域。另外，蒙古人的活动轨迹，多是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西夏诸国的立国之所，耶律铸在副文本中对那些罕有载记的名物之音、义加以详核、考订，这些副文本书写不仅有深邃的学术预流意义，且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语文研究构成独特的交互意义。以此，耶律铸的副文本表达，既是理解13世纪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门槛，又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 耶律铸；13世纪；副文本；知识生产；文脉赓续；知识复兴；学术预流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26)01-0081-12

所谓“副文本”（法文“Paratexte”），是法国叙事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基于“解释的门槛”（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而提出的概念。他认为那些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它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是他人留下的标志”^①等等元素，它们作为交流的地带，其实为读者进入正文提供了“前理解”（Vorurteil），便于读者接受或促进理解文本呈现的元素，甚至新的知识或思想，至少是更恰当地被阅读。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没有“副文本”之类说法，但在书写中，却一直有利用诸如序言、笺注、自序、他序、义疏、评点、图像、印章等形式的“副文本”来引导或传达正文主题的表达习惯。副文本所具有的呼应正文，同又溢出正文之外的独特意味，自宋以来被运用得佳境渐出，引人注目。而13世纪耶律铸（1221—1285）创作中的副文本，缘于其与13世纪蒙古人征略世界大背景的密切关联、对世界格局巨大变革的直接反映以及对旧有传统的拾掇补缀，不仅在文与学、知与识的域度具有边界性突破意味，更成为19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学术对话场域中不容忽略的一手文献。

〔作者简介〕 邱江宁（1973—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浙江 杭州 311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56）

① 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1—72页；聂家伟：《国内副文本理论引介与批评综论》，《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4年第2期。

一、世界新知识的生产意识与耶律铸的副文本

13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崛起和将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行为,旧大陆范围的世界格局与秩序被颠覆和改变,新诞生的“全球史”由蒙古人所主导,这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还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世界史全面打开、文明互鉴的关挈点所在。^①这个过程,耶律家族尤其是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亲见亲闻、深度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耶律铸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起监修国史,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元睿宗拖雷、元宪宗蒙哥五朝实录皆出自耶律铸之手。^②这也就意味着,蒙古三次西征的历史不仅严丝密缝地嵌入耶律铸的人生,而且他还以书写者的身份留下许多历史细节的笺注。副文本既成为耶律铸创作中笺注历史的载体,又在文学与学术的表现上展现出突破性的文本张力。

其一,世界重大事件现场的解读与补充叙述。众所周知,蒙古人从崛起到建成“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③的大一统元朝,其将近百年的征略历程,不仅改变了中国,更致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作为最早一批被蒙古贵族接纳和信任的契丹精英,其人生及创作历程与13世纪世界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呼吸与共、息息相关。极为前沿的见闻、新知,受限于文学性表达的知识内容,往往被耶律铸借助更为自由灵活的副文本有效输出。

如其七言绝句《取和林》“龙飞天府玉滦春,德水清流复旧痕。自非电断光前烈,谁得重沾雨露恩。”^④从用韵用典用辞角度看,这首诗平庸无趣;但如果从副文本角度,看此诗的题目及注释,则此诗反映了13世纪最前沿的知识谱系,代表了新的世界格局方向,而这正是作者很想凸显的内容。“和林”本是后突厥汗国(682—745年)苾伽可汗的宫殿所在地,成吉思汗1220年建都于此,但直到窝阔台在和林城兴建万安宫,蒙古统治者才真正将和林确立为皇都。在副文本中,耶律铸将蒙古人的“取和林”解释为“恢复皇居也”,意味极其深长。诗歌第一句的解释副文本云: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数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经略中原。《易·乾·凿度》曰:圣人受命瑞应,先见于河,河水清。《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必先于河。河清之征,太祖皇帝受命之符也。“德水”见《史记》。唐《凯乐歌辞》:“千年德水清。”^⑤

据副文本内容可知,大安元年(1209年),金朝境内,黄河上下数百里突然变清;次年,庚午年(1210年),成吉思汗南下攻金,黄河的清水恢复浑浊模样。在作者的解释序列中,《易经》《坤灵图》等经典曾有记载,黄河水清意味着圣人生或者天子生。唐太宗贞观时期,黄河水曾持续清澈数年,唐朝《凯乐歌辞·贺朝欢》有颂词云:“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⑥,唐太宗被突厥世界尊为“天可汗”,自然是圣人无疑。在这个解析逻辑中,耶律铸是将成吉思汗与唐太宗相提并论。而副文本中所谓“河清之征,太祖皇帝受命之符”,又是耶律铸呼应和宣传其父耶律楚材在《进征西庚午元历表》中的天命说法。耶律楚材的文章表示,他通过对天象的观测和历法的推算,发现庚午年“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至”那天,“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耶律楚材认为这正是上天给予成吉思汗的“受命之符也”。^⑦

如此,再观耶律铸此诗主题,是叙述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汗在和林建城并作万安宫事。《元史新编》认为,窝阔台建和林城、万安宫的目的是为天下“会同”之用,以此窝阔台还在和林城及周边建设驿站以供“贡输”。^⑧在建万安宫之前,1234年,窝阔台灭亡金朝之后,在答兰-答巴山^⑨召开

① 邱江宁:《丝路纪行:13—14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镜像》,《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1期。

② 陈晓伟:《〈元太祖实录〉纂修所见元初史观》,《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

③ 宋濂等:《元史》卷58《志第十·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册,第1345页。

④ 耶律铸:《取和林》,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页。

⑤ 耶律铸:《取和林》,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6页。

⑥ 刘昫等:《旧唐书》卷28《志第八·音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4页。

⑦ 耶律楚材:《进征西庚午元历表》,《湛然居士文集》卷8,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页。

⑧ 魏源:《元史新编》卷3,《魏源全集》第8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32页。

⑨ “答兰”,蒙古语“七十”之意;“答巴”,蒙古语“山岭”“山隘”之意;“答兰-答巴”,当系一多山之地。

忽里勒台。1235年，窝阔台再次召集“所有的儿子们、亲属和异密们”，并拿出“库藏中所积聚的全部财富，分赠给了与会者”，谋划第二次西征。^①所以，由副文本内容，才能明白耶律铸此诗，“取和林”即突厥人“恢复皇居”的特别内涵。作为元王朝初期五朝实录的主导纂修者，耶律铸以后见之明，努力在历史的纂修中建构起蒙古人应天命而起的发迹历程。《取和林》诗中，从大安元年的“黄河水清”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天象异兆与蒙古的两次世界西征的扣合，作者都试图揭橥成吉思汗、窝阔台家族为代表的突厥人掀开了新世界格局的历史事实。

因为对千年未遇之历史大变局的亲见亲闻，耶律铸倾向于用副文本来补充诗歌情绪之外对历史现场的回溯与解析。如其叙述改变金朝命运的两场重要战役——野狐岭之战与三封山之战。《战扼狐》诗的正文开篇“龙旗天上来，神兵落天阙。问罪下中原，先有扼狐捷”，极尽渲染之辞，力言蒙古军应天命而崛起的如虹之势。而在诗歌的副文本中，作者却冷静地解读历史原委道：“我太祖皇帝未始轻出无名之师，太祖皇帝伯父锡巴哈汗为女真之所害，南伐中原，此其辞也。前战扼狐岭下，敌之精锐尽于是役。”^②蒙古部落本来臣属于金朝，但金人对蒙古人一直十分忌惮，对蒙古人实施颇为残忍的减丁法：“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则丁壮无用”^③，为此，蒙古人的反金情绪一直非常强烈。野狐岭之役，是导致金朝灭亡的关键性战役：蒙古军不仅以少胜多，令金军的野战精锐部队基本消耗殆尽，还趁野狐岭之胜，打开了南下攻略中原的大门，所以耶律铸在副文本中称野狐岭之役为“前战”。耶律铸有意识地运用副文本来表达其潜在的历史书写主旨，诗歌正文表达的是其情感主旨，而副文本才是作者对作品发生现场的知识补充与逻辑规整。通过作品副文本与正文的合璧互训，不仅对解读耶律铸创作正文的恰当意味，有着极为重要的线索意义，更对13世纪世界史诞生，世界格局被暴力打开时的独特面貌，有着不可替代的解释和描述价值。

其二，复杂背景中的“以身入局”之表达。13世纪的世界格局由于蒙古人的搅动而风诡云谲，但不事载记且不通中原语言的蒙古人鲜少留下一鳞半爪的叙述，而耶律铸一生既亲历亲闻蒙古人的征略事迹，又势所难免地卷入到统治高层的权力竞争之局中，欲罢不能。但文学性的表达仅能让作者欲言又止，无法宣泄其隐晦而又饱满的情绪，副文本的解析与倾诉意味不仅使得其传奇人生经历颇有显露，更使得13世纪的蒙古史事得以隐然浮出。

典型如耶律铸的“前后”《结袜子》：

《前结袜子》：五凤声腾白日光，牧野昏荒惨无色。精诚感激致师人，叱咤雷霆觉天窄。《后结袜子》：未应一吐明月珠，便欲延光万千秋。请吞象虎剪鲸鲵，直蹴昆仑过西海。^④

诗歌正文表意隐晦，作者在副文本最后一句也明示，“非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侄而已”^⑤，即诗歌所涉内容并不能宣诸史书和外人，只能对自己的子侄略陈梗概。所谓“结袜子”，用的是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姜尚的典故，作者在副文本中挑明《前结袜子》诗的题旨就是表述姜尚“感恩重”愿意以命相许的意思：“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武王十三年牧野之战，太公年近九十，时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纣之兵七十万。太公与百夫致师，武王驰之，纣众崩畔，是其感恩许命之效也，故作《前结袜子》”。后一首则用隋侯珠的典故表示，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辅助恩人成就大功业。副文本中，作者写道：“壬子岁夏，圣上在潜，仆受再生之恩，自上即真，西北诸藩弄兵不已，因作《后结袜子》以写愚恳。”^⑥

根据副文本中提到的关键讯息“壬子岁”，再结合耶律铸的生平，可以发见，耶律铸这两首诗隐隐展现了蒙古黄金家族窝阔台系与拖雷系之间的那段影响13世纪世界格局的汗位争夺史。“壬子年”是1252年，这一年发生了蒙哥汗肃清窝阔台系势力的行动。此前，1248年，元定宗贵由汗去世；1251年，

① 拉施特：《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59页。

② 耶律铸：《战扼狐》，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30页。

③ 郑思肖：《大义略叙》上，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8336，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0册，第70页。

④ 耶律铸：《结袜子》，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15页。

⑤ 耶律铸：《结袜子》，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15页。

⑥ 耶律铸：《结袜子》，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14—15页。

拖雷长子蒙哥在金帐汗国拔都等人的支持下，成为大汗。^①至此，大蒙古汗国的大汗之位由窝阔台系转至拖雷系。窝阔台系贵族多有不服，贵由汗的侄子失烈门与贵由汗的两个儿子火者、脑忽等以朝觐为名，密谋刺杀蒙哥，中途败露。1252年，蒙哥借“失烈门事件”大肆肃清窝阔台系势力，“分迁诸王于各所”，而“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于没脱赤之地”^②，事态极为严峻。耶律铸与失烈门是少年时代的亲密学侣，甚至很可能也参与了失烈门事件，但最终竟能无事，《前结袜子》诗即隐晦地表示，是因为忽必烈的再生之德。据史书载记和史家考索，蒙哥对失烈门事件的清洗范围极残酷，波及面极大：先是1251年，严讯失烈门兄弟的同谋者和侍从，处死了77人；次年便扩大到搜捕和屠杀反对他的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后妃及其亲信官员，被处死的蒙古贵族达300名之多。^③耶律铸副文本中提到的“圣上在潜”，是指蒙哥即位之后，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交付自己的同胞弟弟忽必烈掌管之事，忽必烈因此驻守“爪忽都之地”^④之事。“爪忽都之地”就是日后推助忽必烈成就一统大业的金莲川潜邸所在地。^⑤所以，不幸卷入巨大历史洪流又幸免于死的耶律铸用前后“结袜子”诗来表达自己由衷的劫后余生之喟叹和舍命报恩、替主分忧之深情。在耶律铸闪烁含蓄的副文本内容中，改变世界格局的蒙古黄金家族内部倾轧情形如草蛇灰线般隐隐透出。

在13世纪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历程中，耶律铸的参与度和见闻知识是极其罕有的，而其副文本借“以身入局”的书写，实际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叙事表达中，诗歌的正文，充当了情绪的宣泄口，而副文本才赋予了正文表达的现场底蕴。如前所述，蒙哥在1251年获得汗位之后，遭到了来自窝阔台系以及与窝阔台系亲近的察合台系贵族和宗王的反对，其清算行动也使蒙古帝国内部的矛盾更为激烈，为缓解内部矛盾，蒙哥于1252年发动第三次西征。由其胞弟旭烈兀率军攻打西亚，与此同时，蒙哥又在东亚战区布置忽必烈作为先锋攻打大理，自己则率军攻打南宋。耶律铸在纂修《征蜀实录》时作《述实录四十韵》，叙述蒙哥亲征南宋事。全诗40韵，560字，是耶律铸诸多战争诗篇中最长、叙事最完整的一首。不仅如此，诗歌正文之外，还有同等篇幅的副文本解释内容，对于蒙哥征宋的前因后果、准备情形以及行军路线、沿途战事等等都有解释。此诗不仅是站在蒙古立场，描述蒙哥征宋的最早实录诗，更是蒙哥命殒钓鱼山的最早表述，尤其是蒙哥死前的多种不祥征兆的细致描述：

莫知天欲将如何，英猷一旦为虚设。无雷东陲孤山峰，御营东山，无雷倾圯。惊风西卷旗竿折。

御营西军，风折旗竿。**龙桥忽焉悉中圯，**攻钓鱼山，上下浮桥遽中圯。**夔鼓攀音贴。然寻亦歇。**大驾战鼓，初闻数十里之外，后虽三数里不闻。^⑥

正文表达情绪，副文本补充现场见闻。在副文本中，作者描述蒙哥死前的诸多异兆写道：蒙哥御营驻扎东山时，营帐无雷却突然倾塌；蒙哥驻蹕西军时，风折断旗杆；攻打钓鱼山之际，浮桥突然中间塌坏；而大驾征战的战鼓起初声闻数十里之外，后面突然三数里之内不闻。最终蒙哥命丧钓鱼山。可以说，从蒙哥夺取汗位到去世，13世纪的世界格局深受震荡。^⑦而耶律铸本人以幸存者和载记者参与和叙述原委，其副文本内容作为知识部分，对其诗歌正文的情绪表达起到了很好的场景再现和见闻补充作

①《元史》载：“元年辛亥夏六月，西方诸王别儿哥、脱哈帖木儿，东方诸王也古、脱忽、亦孙哥、按只带、塔察儿、别里古带，西方诸大将班里赤等，东方诸大将也速不花等，复大会于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斡难河”，《元史》卷3《本纪第三·宪宗》，第1册，第44页。

②《元史》卷3《本纪第三·宪宗》，第1册，第45—46页。

③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二则）：耶律铸生平中被掩盖的一段经历》，《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6页。

④地原名里许东川（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带），地处蒙古高原与汉地交界之处，是南北交通要道，既有利于南下中原，对其进行有效统治，又有利于北上与蒙古大营随时沟通。金世宗曾在此修筑行宫，以此地盛产金莲花，金世宗改其名为金莲川。

⑤《元史》卷4《本纪第四·世祖一》，第1册，第57页。

⑥耶律铸：《述实录四十韵》，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24—25页。引文中楷体内容为诗歌正文，仿宋字体为副文本内容。下同。

⑦此事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蒙古帝国分裂、元朝兴起，更改变了13世纪的世界格局。1268年，海都从阿力麻里举兵南下，自此掀起近四十年的蒙古内战，蒙古人从此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世界战争，陆上丝绸之路因此时常中断，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必须从海上丝绸之路寻求突破。

用，由于他有意识地通过副文本解析诗歌内容，某种程度而言，其副文本与创作正文在整体上形成了情绪与知识相互呼应、各司其职的文体表达效果。

其三，蒙古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13世纪，蒙古人对世界的征略，破坏了传统世界格局，13世纪的书写也因为蒙古人而发生巨大转向。在此之前，有关蒙古人生活的“古代史籍中，缺乏充分的记载，在某些书中，仅录有其中的一鳞半爪”。^①13世纪，蒙古人则成为世界书写的中心。从1221年南宋赵珙的《蒙鞑备录》、1223年金朝刘祁的《北使记》、1237年南宋彭大雅和徐霆的《黑鞑事略》、1247年意大利方济各主教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1248年蒙古治下张德辉的《岭北行纪》、1254年亚美尼亚乞刺可思·刚扎克赛的《海屯行纪》、1255年法国方济各传教士鲁布鲁克的《东行纪》到1263年刘郁的《西使记》等，13世纪的主流书写几乎都在追踪蒙古人的生活细节和征略行踪。比起同时代人，耶律铸1221年生于中亚撒马尔罕，六七岁后，又跟随父亲生活于哈拉和林城，与蒙古贵族如失烈门等结为学侣，成年后又嗣承父亲经营多年的中书省职，而且还是蒙古前五代大汗历史的书写者，耶律铸对于蒙古人日常生活的熟悉程度几乎触及灵魂，这种熟稔往往被转换成副文本中的主体内容，它们不仅标示着作者独特的知识域度，而且也延伸着诗歌正文的表达意味，并与正文共构着诗歌独特的审美意味。典型如耶律铸的《大猎诗二首》：

营表交驰突骑过，射声云布已星罗。诏官点检貔貅数，奏比年前百万多。大驾将校猎，必同日发使，一右一左交周营表而还，然后就猎。

网络周陆万里疆，幅员都是禁围场。传言羽猎争来道，有诏唯教静虎狼。禁地围场，自和林南越沙陀，皆浚以堑，上罗以绳，名曰扎什，实古之虎落也。比岁大猎，特诏先殄除虎狼。^②

王恽云：“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三者而已”。^③三件大事中，“蒐狩”即大型围猎活动，是蒙古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其中所包含的知识细节，颇不为外人所知悉，却又是蒙古人成为世界书写中心之后，区别普通书写的重要审美元素。耶律铸的父亲耶律楚材也有《扈从冬狩》诗：

癸巳，扈从冬狩，独予诵书于穹庐中，因自讥云。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旆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蜚龙震慄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骑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御闲有驯豹，纵之以搏野兽。独有中书倦游客，放下毡帘诵周易。^④

耶律楚材此诗描述了蒙古贵族冬季围猎的场景，很形象地展现了草原狩猎的“斡腹”特征。在旁观者看来，蒙古人先是如行军打仗一般有秩序、有计划、有目的地形成围猎的圆阵，将很多的野兽圈住在这个圆阵之中，其后，蒙古骑兵鱼贯进入圆阵，然后，再慢慢将人墙圈缩小，使野兽与人墙距离进入射程范围，再以射手以及驱赶驯养的虎豹去追逐野兽，以获大功。诗歌副文本中，耶律楚材特别提到了蒙古皇族们使用到的猎豹。

关于皇家冬狩、圆阵以及猎豹实际是深入参与和见证游牧贵族生活的重要标志，构成了耶律楚材等为代表的13世纪高层文人独特的知识域度，像王恽《飞豹行》、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录印度国王遣使向蒙古大汗进献猎豹^⑤的情形等等。比起热闹的圆阵和猎豹，耶律铸的诗则试图在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概念上实现知识密度的深入。第一首诗的正、副文本中反复提到一个词“营表”。古代建造宫室时测量地基，立表以确定位置，谓之“营表”。“营表”在古代主要用于确定建筑物的位置和测量时间。副文本中特别强调和解释了蒙古皇帝围猎过程中，多个队伍必须同日出发这个特殊细节，因为猎物的机敏和捕猎时机的稍纵即逝，所以围猎过程中使用营表测定时机、选定位置极其重要。第二首则特别描述窝阔台

① 拉施特：《史集》第1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分册，第114页。

② 耶律铸：《大猎诗二首》，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120页。

③ 王恽：《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90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册，第497页。

④ 耶律楚材：《扈从冬狩》，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册，第286页。

⑤ 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写道：“我还看见印度一个算端（意为“国王”——笔者注）的使臣，他送来八头豹子和十条猎狗。猎狗受到训练像豹子那样蹲在马背上。我向他们打听印度，在当地的哪个方向，他们指向西方。这些使臣返回时一直跟我们向西走了差不多三个礼拜。”《鲁布鲁克东行纪》，柔克义译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合译本，耿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9页。

汗禁地围猎场的具体位置,这更是高辨识性的知识向度。耶律铸指出“自和林南越沙沱,皆浚以堑”,这些区域都属于窝阔台圈定的围猎场地。接着耶律铸提到一个概念“扎什”,据《双溪醉隐集》国图吴长元钞本,“扎什”当原作“遮歇”,可能是蒙古语jaxa,“边界”意思的音译。窝阔台曾以自陈的口吻,记其毕生四件错事之一,“一件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围拦住,致有怨言”。^①《史集·窝阔台合罕纪》记载,窝阔台曾下令在冬营地汪吉用木头与黏土修筑一长两日程,并设有门的围墙,称作“只喜克”(jyhk),“只喜克”可能即遮歇、jaxa。^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耶律铸对蒙古语的“扎什”之意进行了汉语古意的解析,指出它是“古之虎落”。所谓“虎落”,指古代用以遮护城邑或营寨的竹篱,也用作边塞分界的标志。最早《汉书·晁错传》载:“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颜师古注解云:“虎落者,以竹篴相连遮落之也。”^③现今居延汉代边防遗址中,曾发现以削尖木桩构成的虎落。只有亲历现场且深入理解和明白整个过程,并且有读者意识的人才有可能讲述清楚现场的各个环节的称谓和细节。而比较耶律铸与耶律楚材的诗,会感觉到耶律铸通过副文本解析概念,不仅有补史之阙的效果,更延伸了诗歌内涵,与诗歌正文共构出严谨而前沿的审美场域。

蒙古人的征略打破传统世界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13世纪的世界语境,这一点几乎是13世纪文本表达中的共有体会,但体会的深浅则因人而异。耶律铸“在金元之间,累世贵显,谙习朝廷旧闻”^④,他对现实语境本质性改变的体会应该比常人感受更深,如四库馆臣所指出,耶律铸自小跟随蒙古人征伐,通晓蒙古语,足迹所到之处往往“西北极远之区”,“故所述塞外地理典故,往往详核……尤足以补史之阙矣。”^⑤其副文本在竭力修饰和补充着传统文献的阙疏之际,也有意无意地打破了传统语境的单一性,应该说,耶律铸的见闻与书写代表了13世纪蒙古人主导世界而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汇织的新变,其中体现于副文本中对蒙古人为主体的日常生活习俗、新奇物事的解析,确实具有纠错辩难、增广智识、补史之阙的意义。

二、文脉赅续与耶律铸副文本中的知识复兴意识

此处所谓“知识复兴”(intellectual revival),是指劫后余生的金源文人推动建立起来的“可以自立的知识文化”(self sustaining literati intellectual culture),其核心是复归和赅续北宋那种重文崇儒的传统。一方面是蒙古人的杀戮,尤其是蒙古人切齿痛恨的金人,更是遭遇了惨绝人寰、亡国灭种的杀戮;另一方面是蒙古人的通融,13世纪的所有文明几乎毕陈于蒙古人治下的王朝,元廷之上“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⑥,汉文明不仅不是唯一、而且并非优势文明,“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⑦当此背景,耶律楚材“自任以天下之重”,“用能道济生灵”,时人认为耶律楚材对于保存华夏文明之大意义“视千古为无愧者也”。^⑧耶律铸的功业及创作成绩或许未必能达到父亲的期许,但其副文本很真切地展现出其呼应时代潮流而推进知识复兴,实现赅续传统文脉的努力愿景。

其一,副文本中揭橥的中华传统知识赅续意味。现今留下的耶律铸六卷《双溪醉隐集》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乐府诗,有128首之多,是元代非汉族诗人创作乐府诗最多者。^⑨耶律铸有音乐天赋,且主持参与了元初宫廷音乐和舞蹈的制作,“初,清庙雅乐,止有登歌,诏铸制宫悬八佾^⑩之舞”。^⑪他在乐府诗创作中,每每以副文本的形式来叙录和梳理乐府诗题的来源、出处,试图将中原的制度与文化恢复

① 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续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01页。

② 《史集》第2卷,第71页。

③ 班固:《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第十九》,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6—2287页。

④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双溪醉隐集”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31页。

⑤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双溪醉隐集”条,第1431—1432页。

⑥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册,第178页。

⑦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智超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⑧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8,第1册,第169—170页。

⑨ 郭丽:《元代契丹族诗人耶律铸乐府诗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⑩ 传统礼乐制度对于用乐规模有等级上的具体规定:皇帝用“宫悬”“八佾”,规模为64人;诸侯用“轩悬”“六佾”,规模为36人;卿、大夫用“判悬”“四佾”,规模为16人;士用“特悬”“二佾”,规模为4人。

⑪ 《元史》卷146《列传第三十三·耶律铸传》,第11册,第3465页。

并植入到新王朝的建构体系里。如其《凯乐歌词曲》副文本云：

《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大司马》曰：师有功，则凯乐献于社。《司马法》曰：得意则凯乐、凯歌以示喜也。崔豹《古今注》引《周礼》：王大捷，则令凯乐。军大捷，则令凯歌。与其所引不同，《周礼》无凯乐、凯歌之别。然则豹之辨君臣尊卑之说，于理为得，不无所据。郭茂倩编次《乐府诗集》，有晋《凯歌》二首，隋《凯乐歌辞》三首，唐《凯乐歌辞》四首、《凯歌》六首，咏其君臣殊勋异绩。圣上恭行天讨，北服不庭，命将问罪，南举江表。国家盛事不可不述，拟唐《凯歌》体，敢作凯乐凯歌云。^①

引文中，耶律铸对“凯乐凯歌”这种表达形式进行了“考之以制度”式的梳理，从“凯乐”最早见于《周礼·大司乐》载记说起，由《周礼·大司马》《周礼·司马法》的记录来解释凯乐、凯歌的主题；接着又辨析西晋时期崔豹《古今注》中对于凯乐、凯歌的区分，再翻检郭茂倩编次的《乐府诗集》中的凯歌创作情形，进而落实于自己书写的忽必烈军事征略活动，“圣上恭行天讨，北服不庭，命将问罪，南举江表”。征伐本是蒙古人出于生存而进行的本能之事。在开战前，蒙古人还喜欢通过奏乐的方式来搅乱野兽和敌对方的军心。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战阵列好后，按照鞑靼人的习俗，在投入战斗前要奏响各种器乐号角，继而高唱战歌，直到敲响铙钹或战鼓来发出攻击信号，战斗才将开始。因而此时的战场上号乐喧天，歌声震耳”。^②儒家传统文化也是礼乐文化，同样非常重视音乐的作用，但目的在于教化，《周官·大司徒》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③耶律铸先后拟唐之《凯歌》体作“凯乐凯歌词”36首，在表达自己对国朝盛事“不可不述”的激情之际，以赓续传统礼乐文化为己任，试图通过凯歌实现“史笔”与“诗教”的结合，将蒙古人的征伐以及征伐过程中的奏乐行为规整到儒家传统文明叙述体系中。

作为追随和叙述蒙古前四汗（成吉思汗、贵由汗、窝阔台汗、蒙哥汗）征略历程的幸运者，耶律铸对于亲历亲见的新奇内容，努力在创作中将其纳入传统知识序列的梳理与承续中。典型如其《婆罗门》诗六首，描述了安西都护内诸如热海、冻城之类的奇特气候，北庭都护府境天山军设置区域的自然景象。而如果没有副文本的解析，令人备感陌生的是作者以“婆罗门”为题来书写安西、北庭之景：

有索赋《婆罗门辞》者，时西北诸王弄边，余方阅《西域传》，因为赋此。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婆罗门辞》也。《乐苑》曰：《婆罗门》，商调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会要》曰：天宝十三载，改《婆罗门》为《霓裳羽衣》。^④

由耶律铸此诗副文本的追溯知道，《婆罗门辞》在开元时被唐玄宗改为《霓裳羽衣曲》，遂由胡人雅，循入中国知识序列，西域色彩亦逐渐隐去，到唐五代时期的王建已不知道霓裳曲出自西域。^⑤“婆罗门”曲来自西域龟兹，其音乐内容皆表达龟兹地域风情。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向时间的永久性中断提供了空间的连续性，并且，正是就语言分析、表达和划分表象而言，语言才具有在时间的跨度上把我们关于物的认识连接起来的力量。”^⑥耶律铸的副文本即承担了填充历史长河中，词与物之间的空间缝隙的功能。副文本中，耶律铸提到“时西北诸王弄边，余方阅《西域传》”，西北诸王弄边，指的是前文提到的海都从阿力麻里掀起西北诸王之乱，而据唐朝对西域的策略，其时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等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主管天山以南区域，北庭都护府负责天山以北，包括今天的伊犁河流域等区域。阿力麻里位于伊犁，即属于北庭都护府的辖区。所以耶律铸写《婆罗门》诗六首，描述了安西都护境内的热海、冻城，青岭与赤河，雪海与雪山；北庭都护府境内的瀚海军、天山军，驿路黄草泊、白杨河以及出兵路之弓月道等等内容，在梳理《婆罗门》曲融入中原音乐和

① 耶律铸：《凯乐歌词曲并序》，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6页。

② 马可·波罗口述，谦诺笔录：《马可·波罗游记》，余前帆译注，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165—166页。

③ 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10《大司徒》，《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24页。

④ 耶律铸：《婆罗门》，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15—16页。

⑤ “欧阳公《归田录》论王建《霓裳》词‘弟子部中留一曲，听风听水作《霓裳》’，以不晓听风听水之义为恨。予观唐人《西域记》：龟兹国王与臣庶知乐者，于泰山间听风水之声，均节成音，后翻入中国，如《伊州》、《甘州》、《凉州》，皆龟兹境也，此说近之。”邓子勉编：《明词话全编·彭大翼辑词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3229页。

⑥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5页。

乐府创作的历史脉络之际,未尝不是期望元廷可以借鉴唐朝处理西域的方式来实现元朝对海都之乱之平定、西域被纳入元朝的结果。

热奈特在解释副文本的意义时认为,“没有副文本的文本有时候像没有赶象人的大象,失去了力量”^①,副文本是用来展示作品内外一切材料的域界手段与常规,在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起着复杂的斡旋作用。事实上,凭着迥出同时代人的学识与见闻,更兼修史与赓续传统的责任意识,耶律铸每每以副文本的形式,将自己的知识史、阅读史、见闻见识融入诗歌情绪的表达中。其副文本在为诗歌正解提供恰当的门槛和台阶之际,承载着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意味。

其二,副文本中传统审美意味的传达。金朝从金太宗认同“中国”制度,全面推动汉化改革开始,便有“正统天下,高视诸邦”^②的自觉意识,金世宗更直云“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③金亡后,苟全于元朝的金源文人^④竭尽所能,期望“用夏变夷”,在新朝推进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形态的恢复。耶律楚材父子毫不例外地卷入金源精英“用夏变夷”的洪流中。而耶律铸的创作也以似隐实显的方式,传达了他对北宋及金朝所开创的审美哲学的深度缅怀和致敬意味,其创作中关于牡丹主题创作的副文本可谓典型。

金元时期的牡丹主题诗词有250余首,耶律铸题咏牡丹的作品有14篇,是金元作家中该主题创作最夥者之一。^⑤尤令人惊叹的是,其《天香台牡丹赋》的副文本中,胪列的牡丹品种达120种之多,此前著名如欧阳修的《洛阳花木记》所记牡丹品种仅24种。在这胪列形态的副文本背后,用到的“牡丹谱”及相关文集、图画,几乎穷尽13世纪之前有关牡丹记录和书写的作品,这与其说是耶律铸对于牡丹近于痴狂的喜爱,还不如说是,这种痴狂背后,时时处处都浸润和蕴含着作者对过往盛世繁华的追忆和传统审美内蕴的复刻追求。细品文中的副文本表达:

花雨漫天,金莲布地。北中金莲,每至夏日特盛。姿艳殊绝,未见其匹。金章庙常宴泰和官夏日牡丹,顾谓元妃李氏曰:“牡丹诚独冠花品,以金莲罗列其下,尤风流可爱,可谓潘妃步步生金莲。”^⑥

副文本内容是叙录金章宗夏日常在泰和宫赏牡丹的往事,但这平常往事其实很不平常。牡丹最早曾见载于《诗经·郑风·溱洧》,以“芍药”为名,从一开始便与明艳的青春和美好的岁月勾连在一起,代表着农耕文明世界里最浪漫旖旎的风光。唐朝时期,曾掀起牡丹种植与吟赏的第一次高潮,花运与国运交相辉映,牡丹成为唐朝盛世繁华的典型象征。宋朝时期,由于两位开国皇帝宋太祖、宋太宗出生洛阳,故对洛阳牡丹尤为青睐,至宋仁宗时,洛阳牡丹遂甲天下。在欧阳修、邵雍等著名士大夫的推动下,牡丹更成为士民雅集的著名文化符号。可以说,由唐及宋,牡丹在统治者与精英文人和民众的共同推动下,不仅成为融艺术内涵和政治意蕴为一体的重要审美意象,而且承载着唐宋盛世繁华的诸般美好记忆。金章宗是金朝诸帝中汉文化水平最高者,金朝的汉化改革也最终完成于金章宗一朝。在全面推进汉化改革之际,金章宗对汉地风雅文化的象征——洛阳牡丹的培育格外用心,刻意在泰和宫中培育出牡丹,并作《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云“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⑦诗中的泰和宫,位于今河北涿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的地带,气候寒冷,并不适宜种植牡丹,所以金章宗在泰和宫培育出牡丹,极不寻常。奉旨赋诗的赵秉文《五月牡丹应制》叙述此事原委云:“好事天工养露芽,阳和趁及六龙车。天香护日迎朱辇,国色留春待翠华。谷雨曾霑青帝泽,薰风又卷赤城霞。金槃荐瑞休嗟晚,犹是人间第一花”。^⑧金章宗君臣对牡丹的吟咏,都试图借自然造物之异象来暗喻文化正宗北移至金朝,金朝文化比肩汉、唐之意。史书评述金章宗云“章宗在位二

① 转引自金宏宇等:《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② 《回鹘子》,佚名编:《大金吊伐录校补》,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17页。

③ 脱脱等:《金史》卷28《志第九·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册,第694页。

④ “金源”之名,源于金代,因金朝早期都城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流域,金人称其为“金源”,故有金源文化、金源文人之表达。

⑤ 路成文:《金元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⑥ 耶律铸:《天香台牡丹赋》,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1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册,第4页。

⑦ 完颜璟:《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全金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48页。

⑧ 赵秉文:《五月牡丹应制》,元好问编:《中州集》丙集第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201页。

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①所以，耶律铸在副文本中对泰和宫中牡丹与北地特有的金莲相映成趣、风姿绝色情景的表达，既浸淫着对传统儒家审美意蕴的赓续和慨叹，又包含着自己对元朝“用夏变夷”事业的期许之意。

耶律铸“其家在金元之间，累世贵显，谙习朝廷旧闻，集中如琼林园、龙和宫诸赋，叙述海陵、章宗轶事及宫室制度，多金史所未及。其他题咏，亦多关系燕都故实，而帝京景物略^②诸书均未纪录，亦足以资博识也。”^③当耶律铸在利用副文本为其正文表达增添解释意味之际，作为13世纪见闻、知识和趣味最为丰厚的接受者，以及具有清晰的表达意愿者，他以副文本的形式来梳理和构建被战火摧残的传统韵致与生活美学，借牡丹这一物事和意象的深入推进，一切意味都有了具象的表达。

其三，副文本对传统表达范式的赓续。耶律铸父子承继的金朝文学，曾通过“借才异代”的方式获得了本质性的飞跃成长，正如郝经概括指出，建立于辽、宋基础之上的金源文物制度，“胜残去杀于乎仁”，最终得以“汉火百炼金源金，周制一用中华中”，而金源文人也力图以读尽世间书的态度，来实现对“借才”对象的模仿与超越。^④金朝文人模仿对象中，尤重“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所谓“金之慕苏，亦犹宋之宗程”。^⑤在宋、金隔绝的环境中，金朝文人“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⑥，而朝廷科举之利更加推动“群然师眉山”。^⑦耶律家族则是苏轼影响靡及金朝、“苏学盛于北”的重要推手。^⑧耶律楚材娶妻苏氏，乃“东坡先生四世孙威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铸”^⑨，也就是说，耶律铸是苏轼后裔苏氏之子。在金源文人盛学苏轼的风声气习中，耶律铸对苏轼的学习同样“沉酣濡截入骨已深”^⑩，如上引，耶律铸创作多篇牡丹主题的诗文，也有苏轼的影响在内。在唐、宋文人关于牡丹的题咏作品中，苏轼一人便有30余篇，乃其中创作之最者。耶律铸关于牡丹主题的创作篇数不能与苏轼比，但篇幅却远超苏轼。

耶律铸对副文本形式的使用不能说完全得自苏轼的启发，但借由他对苏轼作品的熟稔与模仿，可以察见他对苏轼及其创作精神的承继与呼应。如其诗《克临安》：

拟歌陌上行人去，犹自传歌陌上花。花解语时应也问，即今春色媚谁家。坡仙有《陌上花》，其序

云：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词鄙野，为易之云：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还歌缓缓归。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辇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⑪

如果不能借助副文本内容来参看诗歌题目及正文内容，则不论怎样解读都不免差强人意。借助副文本内容，则可体察作者创作之深意，明白作者对于苏轼写作技法的模仿与绍续之意。由副文本之线索查苏东坡所作《陌上花》，乃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作于杭州的《清平调·陌上花》。据苏轼之序知道，《陌上花》曲得自吴越俗曲，乃婉曲表达宋太祖兵不血刃，将吴越钱王的基业纳入大宋版图，令钱王俶前往汴京受封之事。^⑫耶律铸的诗作从内容形式到主题意蕴都有复刻苏轼创作之意。至元十一

①《金史》卷12《本纪第十二·章宗四》，第1册，第285—286页。

②《帝京景物略》是明代刘侗、于奕正同撰的历史地理著作，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

③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双溪醉隐集”条，第1431页。

④郝经：《读党丞旨集》，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239页。

⑤宋濂：《跋东坡所书眉子石砚歌后》，《宋濂全集·潜溪前集》卷9，张文德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⑥虞集：《刘桂隐存稿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82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6册，第111页。

⑦袁桷：《曹伯明文集序》，《袁桷集校注》卷22，杨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57页。

⑧贾秀云：《耶律楚材家族与苏学的关联》，《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⑨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8，第1册，第177页。

⑩于慎行：《谷山笔麈》卷8，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

⑪耶律铸：《克临安》，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3—4页。

⑫苏轼《陌上花三首并引》自注云：“吴越王妃以开宝九年三月，随王入朝。《五代史》：吴越钱弘俶，宋太祖时常来朝，遣还国。太平兴国三年，诏俶来朝，始举族归京师。”苏轼：《苏轼诗集》，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93页。

年（1274年），忽必烈决定大举攻宋，临出军前，忽必烈对攻宋大帅伯颜谕旨曰：“昔曹彬^①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②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大军攻克临安，耶律铸《克临安》诗即出自其叙述蒙古军平定江南的《凯歌凯乐词》九首之一，所以耶律铸不仅沿袭苏轼改易旧曲之意，更继承其创作精神，将平常的文人词改易成国家奏凯之乐歌。耶律铸诗中，“犹自传歌陌上花”呼应了苏轼词中“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的意思，而结句“即今春色媚谁家”更以阔朗豪迈之气，既回答也应和苏轼诗句“江山犹是昔人非”的感慨。最重要的是，苏轼诗歌乃是吟诵江南和平归入北宋版图之事，而耶律铸诗歌表彰的伯颜则与当年曹彬一般，“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③，和平一统江南。所以耶律铸领会苏轼诗歌之意，既感叹“江山犹是昔人非”主题，但也隐然与其《凯歌凯乐词》中其他曲所诵“文轨混同”、南北一统的主题呼应。这首看似平常的《克临安》，由于与苏轼旧曲在技法和创作精神上的关联而倍加出彩，要破译这层创作上的出彩就必须借助耶律铸创作中副文本内容的输出。副文本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既是历史现场的笺注，又承载知识复兴、赓续文明的意义。

13世纪的世界，因为蒙古铁骑而发生巨变，如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所表述“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城址则变成‘平坦的原野’”。^④耶律铸生于1221年，去世于1285年，在他生活的60余年间，蒙古人发动的三次西征以及灭夏、灭金、灭宋、灭大理等战争导致了人类上千年的文明几乎毁于一旦。1235年，在金朝刚刚灭亡的第二年，耶律楚材在给15岁的耶律铸生日祝诗中期望儿子能承继先人遗烈，“扶颠危”“进仁义”，精进儒术，薰炙“祖道”^⑤，担当起时代大变革下，知识重建、文脉赓续的重任，最终“兴复斯文”“道济天下”^⑥，耶律铸创作中的副文本意义或许当如是观。

三、耶律铸副文本的学术预流意义

作为13世纪蒙古人征略世界的见证与书写者，耶律铸有意识地在副文本中对蒙古人活动轨迹所涉及的塞外地理典故加以详核、考订。这些内容在“汉人”中心视角的传统文献书写中本处于边缘的地位，却在19世纪的世界学术格局中成为主流，而耶律铸的副文本也因此具有了学术预流的意义。“学术预流”之说，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意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⑦，是指出研究所涉及的材料、问题和观点在时代与世界学术潮流中的参与对话意义。如四库馆臣所揭示，“（耶律铸）早从征伐，足迹涉历，多西北极远之区”^⑧，这些区域往往正是“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西夏诸国”^⑨立国之所，而目睹和历经文明浩劫的耶律铸，其副文本在古典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等方面具有了陈寅恪所谓的学术预流意义。

其一，古典语文意义的考察与传达。陈寅恪的“预流”说提出的重要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等一批优秀学者力图以“殊族之史，异域之文”的研究而参与世界学术之林的对话序列中，而13世纪耶律铸的副文本即因此深刻嵌入19—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轨道中。相比同代人，耶律铸的优势就在于他自小生活于蒙古人周围，不仅深谙“殊族之史，异域之文”，更重要的是作为修史者，耶律铸

①《宋史·曹彬传》载：“长围中，彬每缓师，冀煜归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谕之曰：‘事势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归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脱脱等：《宋史》卷258《列传第十七·曹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册，第8980页。

②《元史》卷127《列传第十四·伯颜》，第10册，第3100页。

③伯颜：《奉使收江南》，杨镰主编：《全元诗》第9册，第110页。

④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5—116页。

⑤耶律楚材：《为子铸作诗三十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2，第271页。

⑥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40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册，第709页。

⑦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双溪醉隐集”条，第1431页。

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47页。

还有意将蒙古人的历史纳入中原正统叙事之列，所以耶律铸在副文本中，非常注意从历史语文的角度来比对其语言变化，极富学术探究意识。

如耶律铸七言绝句《涿邪山》诗副文本对“处月”“天竺”等词的注释：

我军败敌于涿邪。余尝有《处月说》，稗载其略于此云云。南邻处月之郊，和林城唐碑文也。未晓处月之为言，有问及余者，因为之说云云。处月之言磧鹵地也。《史记》：汉复使因杆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涂山。注：音邪。《前书》：因杆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后书·祭彤传》：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妄言以为涿邪山。《窦宪传》：邓鸿与后诸军会涿邪山。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闻汉兵来，悉度漠去。班固《燕然山铭》：经磧鹵，绝大漠，踰涿邪。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按《唐史》：沙陀，处月种也。《庄宗纪》：其先本号朱邪，后自号沙陀，而以朱邪为姓者是也。《南部新书》：北人三十辈，于大山中见一小儿，遂收而递养之。长求姓，众云：人共育得大，遂以诸耶为姓。朱邪者，讹也。此说可笑。朱邪，即涿邪也。诸耶二字，俱是华言。遐荒殊俗，隔绝中华，焉如华言以为族望。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蒲类海之东，皆沙漠磧鹵地也。《西汉书》注：薛瓌曰：沙土曰漠。其说得之，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磧鹵为朱邪。岂可谓以诸人为父耶！朱邪，初曰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为川如。天竺，初曰身毒，后转为捐毒，又转为天竺，竺省文作竺，竺又转为竹音。蠕蠕，初曰柔然，后曰蠕蠕，又曰芮芮。狄历，讹为敕勒，又讹铁革。步摇，讹为慕容。秃发，讹为吐蕃。若此之类，不可胜记，是皆从其鞮译及所书之人，乡音轻重缓急而致然尔。且诸夏方言尚不能同，况中国事记外国语，元无本字，但取其音声之近似，不可取其训诂。训者，释所言之理。诂者，通其指义。所记之语，既无本字，岂有所言之理，所通指义者哉云云。^①

上所引文字篇幅显得有些繁冗，但实际却是对“汉族”中心书写立场下被忽略和误读的“非汉民族”文献材料的发现与解读。耶律铸借助自小生活于突厥人周围的地理、语言认知，梳理汉文献中的历史记录，通过审音勘同之法指出“处月”就是“涿邪”，是居处于金娑山之阳，蒲类海之东的沙漠磧鹵地的突厥部落。耶律铸对自己的语言、地理知识和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指出，历代汉文献记载之所以会出现诸如“狄历，讹为敕勒，又讹铁革。步摇，讹为慕容。秃发，讹为吐蕃”之类的讹谬，在于汉文献皆根据“其鞮译及所书之人”的发音而记字，但翻译与记录者有“乡音轻重缓急”的差异，故不免讹谬。而且以“中国事记外国语”，“所记之语，既无本字，岂有所言之理，所通指义者哉”，那就会造成极大的讹谬。耶律铸认为，对于中原之外事物的记载“但取其音声之近似，不可取其训诂”。其考辨中所运用的语文方法以及阐释表述，已经不自觉地“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从个别考据进入到或整合为古代世界的全体”^②，每个字词或地名的考察实际都是文化史的考察，为民族交融的细节提供了更多丰富的线索。

王国维曾概述清朝三百年学术之变化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③这种新气象的发生在于它受到域外汉学的影响，重视西北边疆地理，注重通过审音勘同之法，推进学术新材料、新问题、新观点的发现。也正是在这个层面，耶律铸副文本知识的外延性学术意义尤值得重估。

其二，殊族异域史料的世界对话意义。耶律铸身当蒙古人最得势的时代，并主修蒙古初期五位大汗的历史，所以他对于历代汉文献中作为“殊族之史，异域之文”的突厥人记载都有关注和梳理，而且其材料的一手程度和珍稀程度几乎具有不可撼动的世界前沿性意义。例如前引《取和林》的另一段副文本：

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按《唐史·突厥传》：阙特勒，骨咄禄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阙。可汗之子弟谓之特勒。开元十九年，阙特勒卒。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使北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文，别立祠庙，刻石为像。

① 耶律铸：《涿邪山》，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9—10页。

② 张伯伟：《文献学与Philologie：旧领域的新认识及其可能的未来》，《文献》2023年第6期。

③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黄爱梅点校，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02页。

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额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旧史，凡书特勤皆作衙勒之勒字，误也。诸突厥部之遗俗，犹呼其可汗之子弟为特勤，勤谨字也，则与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唐新旧史并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当以碑文为正。^①

上引副文本中，指出和林乃突厥人的祖庭所在，整段文字特述和林城东北七十里处阙特勤碑树立原委，并纠正唐新旧史中，“勤”皆作“勒”之误。此段副文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备受关注。1889年，俄国考古探险队在和林城旧址（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发现《阙特勤碑》《突厥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等汉文、突厥文双语碑，从而掀开国际突厥研究的热潮。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A. P. Cassini）故意将三块碑文的影本递交清政府请求解读，沈曾植对三碑汉文内容进行详细考证，其中尤其重要的一条史料证据便是耶律铸的这段关于阙特勤碑考证的副文本。沈曾植在《阙特勤碑跋》中写道：“此碑不传，独耶律双溪一人见之耳。此碑为考据和林之坚证，得此碑而和林所在，异说纷纷，不待攻而自破矣”。^②沈曾植考证文章出来之后，“俄人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引其说”^③，影响达于中外。道、咸以来，中国被世界豪强所凌压，国势颇弱，学者、士大夫力图通过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方式来振作国势。因此，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特别站在清代学术之变的视角，高度赞扬沈曾植学问。在王国维看来，“国家与学术为存亡”。^④沈曾植的异族研究能震惊世界学术之林，故而代表世界学术研究的新方向，而耶律铸副文本对于异族文献的关注与载记也由此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其三，多民族交融互嵌的实证意义。耶律铸本是契丹血种，既生活于突厥人中间，又通晓中原文献典籍，又以纂修蒙古人发迹史以及知识重建为己任，其书写内容尤其关注多民族交融互嵌的问题，亦因此在此副文本留下大量实证考察内容。典型如其《行帐八珍诗》的一条关于“麇沆”的考证内容：

麇沆，马酮也。《汉》有捫马，注曰：以韦革为夹兜盛马乳，捫治之味酢，可饮，因以为官。又《礼乐志》大官捫马酒，注曰：以马乳为酒。言捫之味酢则不然，愈捫治则味愈甘。捫逾万杵，香味醇浓甘美，谓之麇沆。麇沆，奄蔡语也，国朝因之。奄蔡，《西汉·西域传》无音。《大宛传》宛王昧蔡，师古曰：蔡，千葛切。《书》二百里蔡，毛晃韵：蔡，桑葛切。《广韵》亦然。奄蔡，蔡，千葛切为是。今有其种，率皆从事捫马。^⑤

“麇沆”是奄蔡语对马乳酒的表述，蒙古人也跟着称“麇沆”。奄蔡国是位于西伯利亚西南部的欧洲和亚洲交界处的西域游牧古国，古希腊罗马文献中称之为Aorsoi、Alanorsi，汉文文献最早关于“奄蔡”的记载出自《史记·大宛列传》，耶律铸指出《汉书·西域传》已不详该国名称的读音，《汉书·礼乐志》中有捫马酒的表述，但“麇沆”比“马酮”捫治的时间更久，其色泽更为清澈，味道更为纯粹清甜。在13世纪诸多关于蒙古人的文献中，诸如《黑鞑事略》《鲁布鲁克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以及上京纪行诗中有相关记载，但最早将“麇沆”与“奄蔡”国相联系并考察认定其读音的，却出自耶律铸的副文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道光、咸丰以来，受西潮冲击的中国学术在努力参与世界学术对话体系之际，逐渐转向西北边疆学问的探查，13世纪蒙古人所掀起的民族迁徙高潮以及其间的多民族交融互嵌内容尤为一代精英学者所重视，其中，耶律铸的副文本内容几乎是最不容忽略的实证性存在。

综上所述，风格是语言的影子，而语言是思想与见识的全部体现。耶律铸作为13世纪搅动全世界格局的蒙古前五汗史的纂修者，他见证和记录的是13世纪旧世界被摧毁，世界史新诞生的最惊心动魄的内容。在既矜持于史家身份，又眩惑于见闻之际，耶律铸以副文本的形式来承载他的所有思想与见识，而其中包含的突厥史、蒙古史、世界史以及古典史、民族史等等方面的内容，不仅在于其珍贵且不可替代的原始文献意义，更在于它在今天中国学术话语参与世界学术对话之林，以及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成中的多元文明互嵌性特征。

（责任编辑：潘纯琳）

① 耶律铸：《取和林》，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6—7页。

② 沈曾植：《阙特勤碑跋》，《海日楼题跋集》卷2，许全胜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227页。

③ 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第408页。

④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第503页。

⑤ 耶律铸：《行帐八珍诗》，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121—122页。